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一)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作者：赖荣源



佩戴团徽和北京市
优秀学生奖章的
高中毕业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3年，在新中国的强烈感召下，我和许多同班同学抱着“回国深造，建设祖国”的青春理想启程北上，激情满怀投入到祖国的怀抱。

归国几十年来，我努力做到“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坚持践行“初心”，在见证和参与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回顾自己归国以后66年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在北京第八中学念了三年高中外，主要都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期间的许许多多经历，既有正能量的美好人生机遇，其中有些却无奈失去；也有些是属于负面的人生遭遇，受到折磨或折腾。前者主要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机遇，而后者则是改革开放前的遭遇。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值得加以总结。

启蒙南洋

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茂物，城市不算大，但是因城内建有全球第二大热带植物园而成为

避暑游览胜地。我家地处荷兰殖民时期荷兰人聚居地周边，环境宁静舒适。该城上坡地一带商店林立，街上熙熙攘攘，是颇具规模的华侨（华人）社区——“唐人街”，设有比较规范的华侨学校，教授比较完整的华文基础教育，从唱着“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的幼儿园到念诵着“开门见山，山上有树，树上有鸟”的初小班和讲解“辨别韭菜和小麦苗的故事”的高小班，后来又增设初中部。童年和少年时期我家跟大伯父家来往密切，我父亲曾在大伯手下当帮手，两家也曾住在一起。

我跟着大两岁左右的两位堂姐一起去上学。先是在位于下坡地Epag的亲中国国民党的中华学校上两年初小班，后来又先后转学到1945年成立的位于商业区辅路Jalan Roda的正中学校分校和位于上坡地Sukasari的总校，读完了小学。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华侨还能够接受较为系统的华文基础教育，得以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催生“人之初”的中华文化认知和情感的结，这对我们华侨子弟而言是自己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启蒙教育，是值得庆幸的。

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尼西亚政府全面封杀华文学校，禁止传播中华文化，酿成了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区的华文教育中断了长达三十多年，出现了影响两代人的文化断层和人间悲剧。这个文化断层及其严重后遗症是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区的群体之



赖荣源(爬树者)参加正中学校
高小年级合照

痛，也是我们老印度尼西亚归侨心中之痛！为此我们这一代老归侨不免要感恩当年像正中学校这样的母校所赋予我们的接受中华文化启蒙教育的机遇。

1950年我小学毕业，因茂物正中学校当时还未办初中部，为了继续升学，我和两位堂姐前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赶考，入学考试期间还出现了一段饶有情趣的插曲。我们第一步是投考巴城中学，结果只有我一个人榜上有名。缘于长年结伴上学的“情结”，当时我并不同意单独一人入学巴中，而是跟着两位堂姐试着报考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八华中学，不幸的是这次一位堂姐考上了，而我和另一位堂姐落榜。这样，作为落榜生我又跟着落榜的堂姐转而投考一家要求不高的商业会计中专，最后我们俩被录取了。堂姐终于有学校上了，但对我来说此时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内心的直觉告诉我，商专并非自己心仪的学校，而此前我原已考上的巴中是有名的正规中学，也是

当初我们报考的第一志愿学校，应该是我心仪的学校，此时此刻我意识到自己需要独立作明智的升学抉择，在这个紧要节点上我决定自己独自一个人“回归”巴中。

在初中入学考场上的“反复折腾”之后，缘分驱使我宛如一个“浪子回头”最终选择了入册巴中。回头来看，当时入学巴中对正处成长年华的一个少年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金不换”的人生机遇。巴中的读书阅历确实极大影响了以后我的求学之路和人生轨迹的方向。这正如2015年我致印度尼西亚巴中校友会的电子邮件所表达的那样：“在喜迎我们母校七十周年纪念之际，饮水思源，在遥远的北京，让我真诚地表达自己深切感恩母校的心声：在自己走过的近八十年人生道路上，当年巴中母校弥足珍贵的启蒙教育为我的人生铺垫了坚实的起步基石，使我得以坚持一步一个脚印跟着新中国的前进步伐一起成长，圆了当年‘归国深造，建设祖

国’的青春梦想，投身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之中。”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称为“巴达维亚”，华人把它简称为“巴城”。1945年在这里成立的华侨公立巴城中学是一所印度尼西亚尤其是爪哇岛华侨社区享有盛誉的爱国进步学校，师资力量雄厚，不但配备有许多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坚教师队伍，其中有些教师毕业于中国的著名大学，而且还不断吸收本校的年轻有为的毕业生作为新生力量充实师资队伍。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有教文史课的梁英明老师和教物理课的黄天美老师。我上初一和初三时，梁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还先后负责给我们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及语文课。梁老师坚持严谨的教学作风和生动活泼的讲课方法，颇受同学们欢迎。我来自外地小城，孤陋寡闻，平时寡言少语。当时梁老师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一位博学多闻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富有感染力，深得同学喜爱。听梁老师的课使我有机会进一步沐浴优秀中华文化精华，尤其是了解到许许多多的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革命事迹和革命烈士的英勇故事，进而对新中国的诞生和蒸蒸日上发展前景感到欢欣鼓舞。梁老师的课堂教学激发了我的爱国进步的热情，为后来的回国行动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六十多年后，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二)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作者：赖荣源



赖荣源回国前与父母和弟弟妹妹合影

我和梁英明老师都已从北京大学退休多年，在一次北京大学老归侨的聚会上，大家热情洋溢地谈论回国的人生感悟，会后我和梁老师有机会一起边走边谈，我不免感慨地谈起当年聆听梁老师的课堂教诲如何激发我的爱国进步思想和回国行动，他诙谐地说了一句：“那时你们给‘忽悠’了”，当即我由衷地回了一句心里话：“那时候您给我们的的确是成长道路上宝贵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

我在巴中读的是上午班，且属每天乘火车来往于茂物和雅加达上学的走读生，这缘于我家居住在茂物这一环境优美的宜居城市，无意寄宿于市面嫌“脏乱差”，人口拥挤，气候闷热的陌生城市雅加达。每天中午下课后就要赶火车回家，没有时间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课余时间可以自行安排。放学以后，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途经繁华的唐人街即著名的班芝兰(Pancoran)和草埔(Glodok)一带，我经常驻足此地，除了顺便到喜欢的“德记”(Teki)饮食店解决肚子饿的问题，主要目标是光顾一家专

门经营中国书刊的南星书店和附近卡加马达(Gajamada)大道边上另一家兼营体育用品的OK Sport书店，专心寻找自己钟爱的精神食粮。在书店里先浏览一下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尤其是新中国出版的新书，主要是自己喜爱的文学类和政治理论类的新书。初中三年期间我从书店陆续选购了众多的心仪新书，其中文学类的有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以及中国农民土地改革斗争的中国小说如柳青的《铜墙铁壁》、孙犁的《风云初起》、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著名作家赵树理的小说等；描写苏联卫国战争英雄人物故事的苏联小说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及《普通一兵》等；政治理论类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和廖盖隆的《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等等。后来买回来的书积少成多，专门买的书柜都摆满了，这些书据悉在我回国后全都捐给了母校正中学校。

放学回家后，除了做一些课外作业外，我不再像以往那样积极参与亲友们的诸如游泳和打羽毛球等户外活动，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屋内独自一人埋头醉心于阅读这些生动描绘革命斗争和英雄人物故事的小说和讲述革命思想和革命道理的政治理论



赖荣源回国前与父母和弟弟妹妹合影

书以及当地进步报刊如《新报》和《中学生月刊》等；同时，我作为电影迷也如饥似渴地不放弃机会设法观看难得的来自新中国的电影，如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了的中国》、《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以及故事片《白毛女》、《翠岗红旗》以及《钢铁战士》等。源自内心的兴趣爱好，上述较为广泛的课外阅读和观赏活动的耳濡目染，使我得以渐次深化对新物和新观点，拓宽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视角，从而提高了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境界。

1950年代初，在来自新中国的红色潮流影响下，老师的课堂教学和个人的课外阅读“双管齐下”，使我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教

育，潜移默化影响了我初始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及其发展。一方面拥护和热爱新中国的思想感情日臻强烈，对新中国的美好未来十分向往，满怀憧憬，另一方面形成对照的是，对自身所处的印度尼西亚社会和现实生活渐次感到不满意或不如意，似有若即若离的感受，思想情绪上时有莫名的苦闷、惆怅和困惑，陷入了青少年面临时代和社会变迁时特有的“成长的烦恼”。虽然当时我的家庭经济条件经父亲精心经营开始步入小康的佳境，衣食无忧，有钱可花，物质生活需求有保障，但是从精神生活和思想层面上，对新中国的向往和憧憬使我不满足于现有的生活状态，希望自己的生活未来不要流于平庸无为，“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应该争取努力做到自强进取，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正是这个思想认识促使我内心萌生了回到祖国的动机。

1953年临近初中毕业时，组织动员回国升学的活动热烈展开，许多同学踊跃报名，我和同学们一样早有回国的

思想准备，毫不犹豫地第一时间报名，还积极参加“回国同学会”，同学间开展回国前的交流和互助活动，共同办理回国护照签证、海关手续、运送行李，参加集体文化和体育联谊活动等。根据我留存至今的回国护照上的原始记录，这期间经办的一系列离印度尼西亚回国手续有：壹玖伍叁年肆月拾日(April 20, 1953)中国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总领事刘亚民分别签发前往印度尼西亚的护照(侨生需补办中国护照，前页有效期原为April 19, 1954，后页展至壹玖伍伍年肆月拾玖日，April 19, 1955)和壹次有效的前往中国的普通签证(有效期至壹玖伍叁年柒月叁拾日July 30, 1953)；1953年6月3日印度尼西亚政府移民局在签证页上写明“不再重返印度尼西亚”(Tidak akan kembali lagi ke Indonesia)的规定；1953年6月16日出境后又签发申请回国的准字并注明1953年6月22日自雅加达搭乘芝万宜号(Tjiwangi, Royal InterOcean Lines)邮轮，目的地广州，船票号码A143040，支付货币为印度尼西亚卢比(盾)。这一系列繁杂的手续均无需我亲自办理而是由回国同学会中的高年级同学们集体代办，其间运送我的行李过海关检查时，我没有随行，行李已上锁而钥匙却留在我手中，紧急之下他们只得硬将新皮箱的锁撬开，留下一个破损的憾事。那时为回国同学们之间适应未来过集体生活的需要，我们也开展



护照及写有印尼文“不再重返印度尼西亚”的签证页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三)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作者：赖荣源

一些集体联谊活动，其中我参加了茂物白鸽篮球队活动和排练演出中国的舞蹈节目。

我私自报名回国之举事先并没有同父母商量和征得他们的同意。据我所知有的同学因家庭无力筹集回国的盘缠或父母的反对态度，虽有回归的意愿却终未能成行。幸运的是我父亲知道后对我回国的举动表示积极支持，还百忙中帮助筹办回国所需用品。父亲一反平时生活节俭的家风，托人物色购置了两款名牌金笔、一款名贵金表和一大盒绘图用具以及皮制公文包等学习用品，还破例抽空亲自带着我和一位懂行的荷兰裔友人专程赶赴雅加达市选购了一件颇为时髦的毛料大衣、皮衣及其他御寒衣物，回国出行当日还准备了一大箱子的食品可供海上七日大通舱生活的需要。父亲这种无微不至的尽心关怀和支持，令我特别感动，极大地鼓了我回国升学的决心和信心。

回想起来，起初父亲对作为长子的我可能有所期许，当年许多事情往往要把我带在身边，记得父亲为创业自立而到一位亲戚家告贷时，还特地带我到他们之间的商谈现场“旁听”，实际上我是听不懂他们讲的客家话的。有时外出参加相关活动时，往往让母亲带着其他的孩子先走一步，留下我一人，等他们办完事，才带我一起走。而我则是沉溺于闷头读书而对生意上搭把手“毫无感觉”。可能父亲意识到此点，曾哀

叹我是“有得用”了；不过，父亲每每在我学期成绩单上写家长签字时，眼见我的用功学习成绩优良的另一面表现，脸上显露出喜欣满意之情。缘于客家人重视文化教育和华侨崇尚认祖归宗的传统思想，可能也基于对新中国的发展前途有所寄托的希望，父亲继对我回国深造给予大力支持之后，即使因世事变迁，家境几度濒于困窘之际，也还陆续倾囊力助七个成年子女回国，鼓励我们扎根祖国，留守大陆。

针对我们回国的爱国举动，当时的印度尼西亚移民局在我们回国的中国护照页面上特地加注了“不再重回印度尼西亚”，不过这个疑似“给穿小鞋”的举措丝毫不影响我们回国的决心，大家“义无反顾”地响应新中国的号召，怀着“北上回国深造，参加祖国建设”的愿景，毅然决然放弃现有的优越的生活条件，“年少离别”亲爱的父母和亲人（对我来说其实就是永别，当后来有机会重回印度尼西亚探亲时，物是人非，双亲已去世多年），踏上万吨巨轮告别第二故乡——南洋，投入到祖国母亲的伟大怀抱。

回国初期

根据我的旧护照的记载，我们于1955年6月29日通过深圳边防检查站入境。此前我们在香港下船上岸，在半夜中我们被安置在运货车厢，通过开着的车厢门可以观赏到对岸香港本岛满山的万家灯



在回国的邮轮上

火，不过车厢外有港英当局的许多警察站岗，似乎要防范什么，不免令人感到煞风景。天亮时我们抵达祖国边境，跨过深圳桥看到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我们海外赤子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从此我们将在祖国温暖的怀抱中开始新的生活。我们在广州汉口路的一栋楼楼下，等着领取与整理行李。我原与父亲商定，准备留家梅县近，有事好照顾，气候也不冷较易适应，已约好在武汉大学上学的堂兄在此见面。不过我的一些同学则准备继续北上到北京求学，这样便影响了我的原想法，决定改变主意跟着他们一起到令人向往的首都北京读书，便即刻告知堂兄改在北京相聚。

我们7月初到北京，被安排到当时处于郊区建设中的华侨补习学校，因宿舍尚未建好，我们分配在各大教室住下，在已建好的两个大房子集体进餐，七八个人一桌，每桌一大盆菜，多为西红柿或洋白菜炒鸡蛋，每人分一碗菜，白米饭管够。那时还没有洗澡间，我们

爱干净，“因陋就简”找一个合适的露天地方冲洗。不想自己洗衣服的话，可以付费请阿姨洗。我们就这样开始新的集体生活。当时补校尚未具备必要的教学设施和人员，暂时还没有安排我们上课，时间基本

上由我们自己掌握。大家作为新结识的朋友常结伴进城逛街游览，我自己喜欢到东安市场浏览琳琅满目的精美手工艺品，买了一些料器和绒毛动物玩具寄给家里，还告诉他们市场特别整洁，看不到苍蝇乱飞。在补校住了一个多月，便安排我们考试，成绩合格者就分派到北京市各个中学入学，我被分到男子第八中学。

今日在北京第八中学的官网上展示道：“解放初期和五十年代，八中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和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学生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热情，做到了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一切服从祖国的需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运动……高中学生踊跃参军……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大家把零用钱节省下来，捐献给国家购买飞机……抗美援朝的烈火锻炼和教育了全校师生，大家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

北京八中在前进》的长篇报导。‘八中学生政治热情高’的赞美之辞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学校还有意识地让学生在斗争实践中锻炼……朱校长在延安办学多年，他把解放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传统带进了八中，使它成为北京市第一所对外开放的中学。”

在八中读高中三年，我对上述八中优秀的光荣历史传统感同身受，从中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为我今后在祖国大地上“落地生根”打下较为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八中的三年高中学习生活中，我得以践行“与祖国同呼吸，同祖国人民共命运”的意愿。以朱学校长为代表的八中校领导和有关老师通过大会讲话、政治课及团课等方式教导我们要时刻关心国家大事，认真学习和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延安的优秀革命传统和八中的优良学风。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动员下，同学们积极参加诸如1954年庆祝和宣传我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样的重大社会活动，暑假期间放弃休息时间，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少儿部的组织下承担附近小学的少先队辅导员的工作任务。我们几个华侨同学还曾抱着爱国热情踊跃认购我国首次发行的国债，后因依据当时政策规定青年学生并非发售对象，最终我们的钱给退回来，初衷愿望未能实现。

在日常学习生活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四)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作者：赖荣源

中，我们十位华侨同学和班上其他同学相处时都努力做到“同住”“同吃”“同学习”和“同成长”。在住宿上我们没有特殊，每间宿舍分配八个人混合住，其中由于华侨同学行李多，就安排一个床位专门堆放行李，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学经济条件和生活习惯不同，能做到相互包容、尊重和理解。

我们华侨同学面对许多新的情况和生活条件，需要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些变化。不论回国前是否有思想准备，我们经过努力都能逐渐顺应和融入到新的集体生活中。比如华侨同学在海外有爱洗澡的习惯，而学校限于条件只能安排每班两个星期集体挤着洗一次澡。开始时我们几个还抽空跑到补校那个露天洗澡地补一补，后因路远，天气又渐冷，只好改在学校的盥洗间擦擦身，这就算过了一桩“生活关”。

在海外我们一般没有自己动手洗衣服的习惯，刚开始学校还给以关照，从校外安排来人收费代洗衣服，在设法学会使用搓板揉洗衣服之后，衣物都改为自己洗，培养了独立生活的习惯；在海外我们习惯白米饭和牛奶面包，刚回国时连山东筋面白馒头也吃不惯，到学校后，开始时学校为了在生活上照顾我们这些归侨新生，允许我们到条件较好的教师食堂伙伙，但是我们不想特殊化，坚持要在学生食堂与其他同学同桌用餐。那时学生食堂每月每人的伙食费是八块钱，供

应的主食中几乎没有白米饭，连白馒头也成稀有物，每天吃的几乎都是玉米面做的窝头和丝糕，还有高粱米饭，如有玉米面和白面做的金银卷就算是改善了；副食方面供应的不外乎是当时北方常备的大路菜即大白菜、白萝卜、白豆腐，还有胡萝卜，间或能吃到肥猪肉片。这样的伙食水平同样没有影响我们的思想情绪，倒是可视为回国要过的又一个“生活关”。

实际上八中学生的学习生活是有张有弛，其中不乏饶有情趣的活动，除了每年到京城诸多公园集体组织生趣盎然的春游和秋游活动外，周末时间还可以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听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或到名人故居参观学习，或随学校的文艺爱好者小组访问著名作家等；不过就我而言周末时间可个人自由支配，安排活动更显轻松自在。

八中地处按院胡同，离西单闹市仅隔一个街区。我经常利用周末上街，上午到位于西长安街的首都电影院观赏一两部国产或苏联的励志片或文艺片。其中当时给我印象深的是《夏天的故事》，由著名青年作家刘绍棠编剧，著名青年演员赵联主演，叙述一位知识青年响应时代号召回乡务农，为建设新农村作贡献的励志故事；还有讲述苏联卫国战争英雄故事的影片《青年近卫军》和《普通一兵》。走出电影院后便可就近到一家合作食堂（我们一般均为当时盛行的“消费合作社”的会员）



1955年夏赖荣源(前蹲右二)等少先队辅导员合影

用餐，那时我喜爱的美食“快餐”是一份糖醋鱼片加四两白米饭或一盘木樨肉炒饼或肉丝炒面，餐后到西单商场间或买一包核桃仁牛轧糖或小白兔奶糖这类零食，最后压轴的是到我最钟爱的去处——新华书店。书店里各类书籍琳琅满目，真是博览群书的好场所，是学校小小图书室无法比拟的，一排排新书可以随便浏览，自由翻阅，碰到心仪的图书精品，可拿到一个角落仔细赏阅，有的爱不释手就买下带回。在书店驻足翻书，往往觉得时间溜得快，似乎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该回学校的时间，赶去吃晚饭，上晚自习。周末这一天过得满满实实，给我个人留下别样的感受：大快朵颐诚可贵，书海泛舟价更高。

在八中高中三年，我作为归侨学生始终不忘回国初衷，自觉自愿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挥主观能动性力争使自己更能更快地融入到国内的新社会和学校的新的学习生活，以实际行动做一个思想品德好、

学习好、身体好的三好学生。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的努力，在1955年双喜临门，我先后光荣地获得了北京市优秀学生奖章和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在这个期间，有一次上作文课，老师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即仿照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

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1935年应《世界上的一天》征文撰写的《我的一天》的题目做一篇作文。在我作的《我的一天》中，我有意将日常严肃紧张的课堂听讲与课外阅读、雷打不动的晚间自习、课余时间生动活泼的体育锻炼及其他宣扬团结和谐的集体活动等一系列内容，同丰富多彩自有情趣的周末度假活动内容糅合浓缩成一天发生的事情，通过这样的特殊构思，我试图将《我的一天》写成全面反映我在八中学习生活的某种“虚拟化”缩影，从中可以透视出我在精神食粮重于物质享受，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的人生感悟与追求。老师给这篇作文打了当时通行的五分制的5分，在作文篇末还留下这样的评语：“祝贺新的政治生命的诞生”。正是有了这样一篇作文的机缘，后来当海外的一位亲戚写信希望介绍我回国后的学习生活和心得体会时，我顺手将这篇作文稿找来，抄写一遍，寄给他供参阅赏析。他收

阅了以后有何看法和想法，我一直没有问过，他也没有跟我提过。不过，在上世纪50年代不断涌起的回国升学大潮中，他和其他的许多亲戚们都陆续回国开始新的学习生活。时过境迁，到了70年代国内归侨界中出现了一股出境潮，许多归侨根据国家执行的“来去自由”政策办理了出境手续，移居港澳或海外。此时我们亲戚中间有一位无不诡谲地对着我说：荣哥当年可是大家回国的一个带头羊，你看现在我们落得这个样子……。她的这一说法，令人无语，感到莫名了。

1956年我在北京八中高中毕业，当年按规定中国人民大学先于其他高校单独提前举办招生考试，我根据个人志趣和愿景报考了该校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列主义基础两个专业。我们是在当时还处在市中心铁狮子胡同一号的该校校舍参加考试的，考后我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而其他报考的同学都已收到。这样我就转而参加北京大学的招生考试，第一志愿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没有考上，考上了第二志愿经济系当时唯一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我按时报到上课。不过此时出了一桩糊涂事，我突然收到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的录取通知书，来得像一个过了时限的“无厘头”，且又是一个我没有报考的专业，这样我只能将它束之高阁，专心在北大经济系念好书。